

百年中国史话

◎ 陈争平 / 著

外债史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百年中国史话

第三辑

SBL4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债史话/陈争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9

(百年中国史话. 第3辑/王忍之主编)

ISBN 7-80149-342-7

I. 外… II. 陈… III. 外债-经济史-中国-近代 IV. F8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424 号

·百年中国史话·

外债史话



著 者: 陈争平
责任编辑: 杨雁斌 杨 群
装帧设计: 孙元明 魏 凯
责任校对: 杨蔚琴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5.625
字 数: 81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42-7/K·031 本辑定价: 180.00 元
(全套共四辑 720.00 元, 单本 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名 誉 顾 问 胡 绳 刘大年
■ 编委会主任 王忍之
■ 主 编 王忍之 张海鹏

编辑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勇	王 正	王庆成	王忍之
李文海	何秉孟	余绳武	张海鹏
金冲及	郭永才	姜 涛	徐辉琪
龚书铎	谢曙光	戴 逸	

常务编委:

张海鹏 徐辉琪 姜 涛 马 勇

《百年中国史话》丛书总序

王忍之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日子里，我们将这套《百年中国史话》丛书，奉献给正在跨入新世纪的祖国人民。

1840年，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首先用坚船利炮敲开以农立国的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并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一步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但总是一次又一次惨遭失败。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多少志士仁人在挫折中奋起，努力探寻救国救民和发展的道路。他们向西方学习，也向学西方有成效的日本人学习。可是先生们的侵略，总是在不断地打破着学生的迷梦。尤

总 序

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更是旨在灭亡中国。没有现代化，固然无法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没有民族独立，更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英勇斗争，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终结。曾经饱受痛苦和屈辱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抉择。尽管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挫折与失败，在今后现代化事业的道路上，也不会一帆风顺，但“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迎接我们的，是光辉灿烂的美好前途。

古人说过：“温故而知新。”学习历史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一些。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曾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国际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改造党内学习的基本内容。他认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是极坏的作风。他要求党的干部要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真正懂得中国的近百年史。邓小平同

志、江泽民同志也经常提醒党员、干部和青年，要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91年，江泽民同志专门致信李铁映等同志，强调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认识人民政权来之不易，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跨入新世纪的中国人民，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岁月，不应该也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任人宰割的痛苦和屈辱，奋起反抗的失败与胜利，学习西方的经验与教训，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成功与挫折。这是我们前进的起点，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今天的青少年，是未来世纪建设国家的主力军。建设的重任，要求他们多懂一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编写缘起。我们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外的专家学者，写出了大体上反映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九十多本小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组织学者编写了一套《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它是向青少年朋友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希望这两套丛书能相互配合，成为我国未来建设者的好读物。

《百年中国史话》这套丛书，当然不可能囊括一切，但尽可能注意到各个方面，尽可能

总 序

全面地、立体地反映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10 年间，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昨天。发生在昨天的许多故事，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在写作中，或者溶入了自己的见解，或者采纳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指出，谨在此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长期耕耘的学者们一并致谢！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三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 甲午战前的外债	3
1. 鸦片战争前的“商欠” 改“官欠”	3
2. 镇压小刀会、太平军 所用外债	9
3. “西征借款”	15
4. 福建台湾防务借款	21
5. 中法战争用借款	24
6. 实业借款的开始	27
二 清末外债	37
1. 有关甲午战争的外债	37
2. 清末铁路借款	43
3. 所谓“庚子赔款借款”	46
4. 清政府其他外债	52

三	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的	
	外债	60
	1. 南京临时政府的外债	60
	2. 国际银行团对中国借款的垄断及	
	“善后大借款”	65
	3. 1913年5月至1916年北洋	
	政府的外债	72
	4. “西原借款”	81
	5. 新国际银行团与北洋政府后期	
	外债	97
	6. 汉冶萍借日债的历史教训	100
四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外债	117
	1. 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债的整理	117
	2. 美麦借款、美棉麦借款和中德	
	易货信用借款	121
	3.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铁路外债	127
	4.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债	136
	5. 抗战胜利后的外债	151
五	总的评价	164
	参考书目	169

引 言

外债，是向外国政府或外国银行、外国企业等举借的债务。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际债务关系也广泛地发展起来。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外债，不仅成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经济往来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国际外交斗争、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外债问题成为影响中国财政、经济、政治、外交……等许多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以致要对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较为深入一点的考察，就必须了解近代的中国外债。近代不少有识之士痛陈滥借外债的害处，但是又有另外一些中国人明知是火坑，硬要往里跳。旧中国一些政府要人、一些企业家把外债当做救命稻草，梦寐以求。时至今日，不少学者认为近代对华贷款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的主要工具，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主要

方式，也是列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争夺侵略权益的重要手段；旧中国的反动政府则通过外债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进行内战。又有一些人认为应从利用外资的角度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外债。笔者认为从不同角度多方位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外债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应根据历史事实，对近代外债进行具体考察。

外债，又有广狭两义。狭义的仅指政府所借外债，广义的还包括民间所借外债。一般人们所说的近代外债，主要指政府外债。本书亦如此，但对近代民间所借外债中有重要影响者也要论及。从清代到民国，近代中国借过数百笔外债，各笔外债实际用途、贷款条件、外债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等等各有差异。清代外债在甲午战争前后有很大不同；民国外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也有许多差别。本书分四个时期对中国近代外债进行评述。

一 甲午战前的外债

1. 鸦片战争前的“商欠”改“官欠”

中国最早的外债，要从清代乾隆年间的广东十三行说起。当时清政府利用一些广东洋货行行商专门办理对西方商人贸易。人们把这些行商统称之为“广东十三行”。这些行商数目并不固定为13家，多时达26家，少时仅4家，但“十三行”的称呼却沿用了下来。“十三行”享有垄断广东对外贸易的特权，并代清政府收税，协助清政府监督管理对西方的贸易。

18世纪后期，随着中西商业交往的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额的成倍增长，中西商人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除了现货交易外，赊购赊销、预付货款或预付定金等商业信用活动也日趋活跃。在这些活动中，“十三行”行商与西方商人之间相互欠来欠去，债务关系频频出

现。在这些债务关系里面，既出现过外商无力还债，逃之夭夭的情况，也常有一两家中国行商因不能如期归还外债而破产的事情发生。后来，英国大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洋商为了对“十三行”行商实施经济上的控制，常利用商业高利贷放款的办法，使中国行商成为他们的债务人。

高利贷剥削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当时西方社会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逐步废除了高利贷，例如英国于1571年废除高利贷后，最高利率从10%降到1624年的8%，1714年后的5%。而中国的高利贷剥削仍然十分猖獗，乾隆年间广州年息一般都在20%左右，高的达30%~40%。中西利率之差，成为来华外商发财的一个门路。他们贷款给中国行商的利率往往低于中国利率，而高于西方利率，这样既能通过发放商业贷款促进他们对中国的贸易，又能利用利率之差捞取金融上的好处。外国商人出借的款项，往往并不支付现金，而是开出由他们在本国的代理行号承兑的汇票，接受这种贷款的中国行商，必然要接受由西方债主规定的汇率，这样又使西方债主能获取汇率上的利益。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行商在资金周转方面对外商贷款的

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西方债主还能在经济上控制中国行商。进入 19 世纪后，新成立的中国行号，几乎完全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贷款支持，它们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公司的支持与否”。接受贷款的中国行商，不仅要担负沉重的利息，还要接受外国公司的监督。中国行号之间贸易份额的分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决定等等也越来越受到外商的控制。

广东十三行本来都属于封建牙商性质，较富裕者“不过三四家，其余……本非殷实”。几家较富裕者也不是很积极地把资本投入到对外贸易中，而是用于地产投机与家庭奢侈消费中；十三行又不像西方商人那样能得到本国金融组织的撑腰，这就使得十三行在与西商的资金往来中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商的贷款，忍受外商高利贷盘剥。中国行商在另一方面还要成为中国封建官府与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对象。行商要为官府采办贡品，交纳名目繁多的捐纳、捐输、备贡银两等。至于官吏的敲诈，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到乾隆后期，广东十三行行商因亏累日益，无法偿还外债，不得不宣布破产的情况增多，所欠款项增大。

清政府一方面对破产的行商采取抄家、充军等严酷惩罚手段，意图遏制这种势头；另一

方面令其余行商摊还“行欠”（人们把这种破产行商所欠债务称之为“行欠”）。行商们不愿自己掏腰包，于是议定在原来的进出口关税之外再加征“行用”，作为十三行公行清偿破产行商债务的一种保险基金。虽然加征“行用”增加了外商负担，但是由于用行用归还债务，也为外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一种保障”，外商尽管不满也还是接受了。有时由于外商的催逼，行商筹款一时来不及，清政府就令地方官员从官库银、养廉银中先代为垫款。这样，“行欠”用“行用”摊还，以及政府财政介入“行欠”的清偿，使“行欠”由一种“商欠”而带有了部分“官欠”的色彩。

广州行商严启昌开设的兴泰行曾是非常活跃的一家贸易行号，它主要经营茶叶出口和鸦片进口贸易，其交易额曾几乎占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 $\frac{1}{5}$ 至 $\frac{1}{4}$ 。但是到了 1936 年底，兴泰行竟因投机失败并受外国商人高利贷的盘剥，负欠外债达 2738768 元，不能维持信用而宣告破产。时隔半年多，广州行商梁承禧开设的天宝行，也因负欠外商约 100 万元的债务无法偿还而宣告破产。广东公行曾经答应外商分别在 8 年、10 年内清偿兴泰行、天宝行所欠外债，并在鸦片战争前已偿付了一小部分，余

下的 300 万元因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偿付无形中

断。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商品需求日益扩大，而西方出产的毛呢制品在中国很难销售，英国的棉布在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市场，相反中国的“南京布”却一度行销欧美。西方国家用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出产的棉花，及在东南亚殖民地出产的热带产品来交换中国的丝茶，但是这也远远不能抵付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英国侵略势力就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来向中国输出，换取中国的商品和白银。美国、沙俄等西方商人也紧随其后，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鸦片贸易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还给中国人民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1939 年清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派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输入。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大量销毁了依法没收的鸦片，严厉禁止鸦片走私贸易。英国侵略势力为了继续在中国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扩大对华侵略活动，于 1839 年 11 月发动了被称为“强盗战争”的侵华战争，历史学家们把这次战争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争打打谈谈。在这期间，1840 年 3 月英国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上书英国首相巴麦尊，要求英政府代他们向清政府追讨兴